

手语双语研究对聋人教育的启示*

邓慧兰 姚勤敏 林慧思 冯晓雯 施婉萍 香港中文大学

提要 手语语言学研究指出, 自然手语跟口语一样有各方面的语法特征。这些研究让我们了解到聋人是健听社群内一个拥有其自身语言文化的族群。由于社会语言状况跟教育的关系, 聋人可以接触手语和口语这两种语言, 从而获得手语双语的能力。手语双语以前只是一个概念, 并没有实质的科学考察。最近手语语言学及聋童手语语言获得研究的兴起, 不但有助于探讨聋童如何从聋父母身上获得自然手语, 还可以了解他们在从小的口语训练到入学后跟社会接触等环境下如何发展手语双语。虽然这类研究还在起步阶段, 但现有的成果已让很多学者重新思考聋人各种沟通媒介的作用, 也启示了聋人教育的发展方向。最后本文讨论聋童手语双语的发展, 除了可以在聋校的环境推行外, 也可以在融合教育的大前提下, 尝试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这一崭新教育模式。

关键词 手语语言学 语言获得 手语双语 聋人教育 共融教育

1 手语获得研究

语言本身有其复杂性。操本族语者能够从既定的语言单位中衍生出无穷无尽的句子, 也有能力去分辨句子的合语法性, 找出歧义句的不同语义。小孩出生后, 在短短三四年间便能拥有这种能力。这些语言获得的特点促使 Chomsky 提出人脑中有一个专门管理语言系统的独立模块, 这个模块被称为普遍语法。普遍语法是与生俱来的, 也是人类在获得第一语言前的原始状态。普遍语法包括一些所有语言共同拥有的原则和描述语言之间差异的参数。参数的值是固定的, 儿童通过与成人沟通, 在语言输入中拿到正面例证来确定参数的值, 从而获得第一语言。

由于听力不足, 聋童无法完全接收口语的语言信息, 以致普遍语法得不到足够的刺激, 无法跟健听孩子一样获得一套完整的语言系统。有些学者尝试利用聋人的剩余听力, 再配合口语训练, 让聋童学习口语。这种语言学习的过程跟第一语言获得过程不尽相同。聋童即使经过多年的口语训练, 也不一定可以完全掌握整个语言体系。他们的情况就如成人学习第二语言一样, 近期的研究发现, 就算表面上被看成第二语言能力接近操本族语者的学生, 通过语言本质的观察, 他们的内在第二语言系统表征还是不完整的 (Sorace 1993 Tsimpli 2005)。从原则与参数理论来看, 成人第二语言不完整有可能是需要的参数没有被重设 (Tsimpli 2005), 或者是参数有重设, 但操作语言时出了问题 (Goad and White 2004)。聋童学习口语作为第一语言时可能是语料输入根本不完整, 导致需要的原则与参数没有相应设定, 以致内在口语系统变得不完整。

* 感谢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捐助“赛马会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计划”及其中的研究项目。

要让聋童获得一套完整的语言系统, 就要让聋童一出生便接触以视觉作为媒介的手语, 因为聋童在接收手语的语言信息时没有障碍。手语语言获得研究的基本认识就是, 如果让聋童从小接触手语, 普遍语法得以启动, 他们也可以跟健听孩子一样获得第一语言。研究人员早在 1970 年代就注意到手语获得研究的重要性。著名心理语言学家 Bellugi 认为, 研究聋人父母所生的聋童如何获得手语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语言的生物性根源。可是, 当时关于聋童语言获得的学术文章相当缺乏。原因有两个: 第一, 聋人所生的聋童较少 (约占聋人社群的十分之一), 适合参与语言获得研究的聋童就更少; 第二, 语言获得的研究需要建立在成人语法研究之上, 否则很难判断小孩的语言是否合乎目标语言的规则。然而, 在 1970 年代, 手语语言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语言学家对成人手语语法的规则还不太清楚,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太多关于聋童语言获得的研究。

直到 1980 年代, 一些关于聋童如何获得手语的文章陆续出现, 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聋童获得手语的过程跟健听儿童获得口语的过程是相似的。这些研究探讨了手语音系学、手语形态学、手语句法学等等不同的语言范畴 (Paul and Quigley 1994; Marentette and Mayberry 2000; Meier 1982; Lillo-Martin 1991; Chen 2001; Quadros and Lillo-Martin 2007; Tang et al. 2008; Lam 2009)。这些研究证明了聋童跟健听孩子一样可以正常地获得语言, 而该第一语言更可成为聋童学习第二语言的重要基础。

2 手语双语的研究

一般来说, 会操两种语言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把两种语言混合起来使用, 这种现象称为语言混合现象 (language mixing phenomenon)。不少语言学家又将该现象称为语码转换 (code-switching; MacSwan 2009; Chan 2009) 或代码混合 (Muysken 2000)。由于各家说法有所不同, 下文我们将以语言混合一词来代表这种“两种语言混合出现”的语言现象。以往这种语言混合现象被视为是双语者因语言能力缺失而产生的一些没有系统的乱码语言 (language confusion), 实际上, 这是一种误解。当双语语言混合涉及少数民族语言和主流语言的时候, 人们往往认为少数民族语言没有完整性, 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误解更为严重。

最近 20 年的研究发现, 语言混合是双语者一种自然语言能力的反射。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 双语者能根据语境条件来转换语言以达到沟通的效果, 显示了他们灵活的语用或者话语能力 (Grosjean 1982)。现今已经广为接受的论点是, 语言混合没有违反语法而且是具有语言规律的 (Meisel 1994; Muysken 2000)。前提是, 究竟这种现象是双语者在语言混合过程中衍生出的一种语言混合语法 (code-switching grammar), 还是它只反映一种语言规律, 而该规律仍然包含在普遍语法的原则里 (Chan 2009)。由此可见, 语言混合是代表双语者在语言认知上的提升, 并不是双语发展时的某种缺失。同样的, 儿童双语获得研究也观察到, 双语儿童无论在语音还是语序的层面上, 很早就可以分辨两种语言的特性。语言迁移可以是双向的, 意即在双语发展期间, 不管哪种语言强势或弱势, 其中一种结构领域的语言特性会移进另外一种语言里 (Paradis 2001; Yip and Matthews 2007)。Bialystok (2001) 也提到双语儿童的语言获得经验跟单语儿童的不同。除了两种语言的知识之外, 其他经验包括元语意识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读写能力 (literacy), 解难能力 (problem solving) 等都为双语儿童

带来额外的好处。Bialystok(2010)更提到双语儿童在普遍认知,特别是执行控制能力方面,譬如专注度、监控、替换、更新等能力都比单语儿童强,也比他们发展得早。

近年手语语言学也开始探讨聋人手语双语(sign bilingualism)的情况。由于每个聋人的语言背景跟接触手语的时间差异很大, Berent(2004)提出了手语双语者分类方案(见表1)。

研究对象(根据听力情况)	语言	
	自然手语	口语
(A)聋人	(C)L1	(F)L1
(B)健听人	(D)L2 早期	(G)L1.5
	(E)L2 晚期	(H)L2

表1 手语双语种类的划分(引自 Berent 2004: 319表 12.1)

首先,手语双语研究中的双语是指自然手语和口语的获得,而对象可以是(A)聋人,也可以是(B)健听人。L1是指母语,L2则是继母语之后学习的第二语言。L2可以划分为早期的获得(5-10岁)及晚期的获得(青春期以后, after puberty)。如果聋童只是接触口语为他们的第一或唯一语言,他们除了运用剩余听力外,也得依赖“读唇”来收集语料。这跟普遍的第一语言获得情况不同, Berent以(G)L1.5作区分。如果一名聋人(A)生于聋人家庭,父母从小用自然手语跟他沟通,在获得自然手语作为第一语言(C)后,口语成为他的第二语言(H), Berent把这类归为组合ACH。由于一般的聋童生于健听家庭,他们并非以手语作为第一语言,可能只在入读聋校后,甚至是成人后才接触手语,因此很多聋童都是组合ADG或AEG这两类。组合ACH、ADG及AEG这三种手语双语是最典型的例子^①。

在广义的手语双语范畴下,沟通方案可分为同一信道双语(intramodal bilingualism)和跨信道双语。同一信道双语即同时利用两种手语作为媒介,跟口语双语转换一样。若两个语言,一个来自听觉语言信道(auditory-vocal mode),另一个来自视觉语言信道,这类“双语”就被归类为跨信道双语,也就是我们通称的手语双语(Plaza-Pust and Morales-Lopez 2008)。它通指聋人获得并运用两种语言,一个是手语,另一个是口语,而口语则包括言语和书面语两个层面。由于操手语的聋人身处健听社会,口语的输入也会令他们自然地获得手语双语的能力。Quinto-Pozos(2008)观察同一信道手语双语者出现语码转换的现象,如例(1)中的美国手语(以正体表示)跟墨西哥手语(以斜体表示)的语码转换。由于两种手语有不少语音形式是相同的,如指向手势(pointing sign)、量词谓语句(classifier predicates)等,加上美国手语跟墨西哥手语在发展历史中互相影响,其中有很多成分无法分辨来自哪一种手语(以粗体表示)。

- (1) _____ bht & fb _____
- NOT-MATTER **POINT-TV2** *gesture* “**come on**” **POINT-TV2** *QUé*
 not matter that come on that what
- POINT-TV2** *gesture* “**so exciting**”
 take food to mouth

^① 聋人父母生下的健听小孩(CODAs, children of deaf adults),由于他们自小接触自然手语,加上他们会从健听环境中学习口语,他们大多数都是BCF一类。至于在成年后才学习手语的健听人,则归到组合BEF,大部分的手语翻译员和聋校老师等都归入这一类别。

EAT/COMER DELICIOSO POINT-TV2

eat delicious that

'It doesn't matter (regarding Mexican or American food). Tell me what food you really love and get excited about. You know, food that you just can't get enough because it's so tasty.' (American Sign Language(ASL)-Lingua de Señas Mexicana(LSM), QuintoPozos 2008:180)

操手语及口语的手语双语者,除了语码转换以外,他们更会同时说口语和打手语,这种现象被称为语码截搭 (code-blending Emmorey et al 2008)。研究指出手语双语者(健听或聋人)出现语码截搭的频率较语码转换高。例(2)是美国手语跟英语的语码截搭句子,该名手语双语者在说英语 don't think 及 really live 的同时,也打出美国手语 DON'T THINK 和 REALLY LIVE(以下划线表示)。例(3)是香港手语跟粤语的语码截搭句子,其中手语的动词“给₃”带第三人称的屈折成分,以填补口语缺乏的代词,而口语的动词“俾”则接有完成体的体貌词“咗”。整个句子得把手语跟口语全部整合,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 (2) Eng: I don't think he would really live.
 ASL: DON'T THINK REALLY LIVE.
 'I don't think he would really live' (English-ASL, Emmorey et al 2008:48)

- (3) 粤语: 我 俾 咗 一蚊。
 香港手语: 指示₁ 给₃ 一元。
 “我给了他一元。”(粤语-香港手语, Fung Tang and Lam 2008a)

跟口语双语的儿童一样,手语双语的聋童也会出现语言转码或语码截搭的情况 (Baker and van den Bogaerde 2008 Branchini 2009 Fung Tang and Lam 2008h Tang and Fung 2009)。例(4)是一个操香港手语的聋童的语码截搭情况:广东话带出两个谓语“放”跟“高”,他们跟香港手语的量词谓语截搭;谓语的主语则用了手语的指示词,两个谓语就用了另一手语动词“变”来连结。

- (4) 粤语: 放(x4) 高。
 香港手语: 指示[书] 量谓:书_手放 变 量谓:一叠书_形。
 “将这些书一本一本地放上去,变为高高的一叠。”(CC 5:9:8) (粤语-香港手语, Fung Tang and Lam 2008b)

这个语码截搭的情况跟口语的双语操作有点类似,它反映了聋童对两套语言的认知,通过跨信道的媒介有系统地按手语和口语的规律产生语言。如果口语双语研究的成果已经肯定对双语儿童发展的价值,我们有必要探讨手语双语对聋童语言发展及语言教育的影响。

3 手语双语与聋人教育语言的关系

3.1 口语教学

聋人教育与教育语言的关系非常密切。1880年在米兰举行的第二届国际聋人教育会议中的决定对聋人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与会学者认为口语教学远胜过手语教学,只有发展口语才能让聋人自立和融入社会。他们认为必须阻止聋童学习手语,因为手语会对说话和读唇等发展构成负面的影响 (Gallaudet 1881)。于是至今取而代之的是无手语的口语教

学。早在 1979 年, 已有学者发现听说法 (aural approach) 的效果并不理想 (Conrad 1979)。聋人学生毕业时普遍成绩欠佳, 阅读能力偏低。Gregory 等 (1995) 指出在口语教学下, 每 7 个聋人就有一个在口语或手语方面不能掌握基本的语言技巧。Marschak (2004) 提出, 只有 25% 的聋童可以有效地使用口语接受教育。Campbell (1997) 也根据一些脑神经研究指出, 读唇对聋人来说有其自然而独特的功能, 但它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语言信息。

随着人工耳蜗技术的发展, 研究显示早期植入人工耳蜗, 加上紧密的口语训练能有效地帮助聋童发展早期口语 (Nicholas and Geers 2007)。不过, 人工耳蜗虽然能提高听力, 但不能彻底解决其先天或后天的听觉障碍。所以, 辅助科技并不能完全解决聋人教育的问题, 这些助听机器只能帮助部分而不是全部有听觉障碍的儿童 (Spencer and Marschak 2010)。另外, 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报告显示, 聋生在主流学校仍然面对社交孤立的问题, 并且在参与课堂活动方面困难重重 (Antia, Stinson and Gaustad 2002)。许多聋童无法适应主流学校的生活, 最终回流到聋人学校。但是, 现今亚洲很多聋校跟主流学校一样采用口语主导的教学模式, 并没有引进自然手语作为语言教学媒介。聋生每天都面对课堂学习中因沟通障碍而导致的各种困难, 而主流学校要面对的问题是在融合教育的目标下, 怎样帮助聋生提高学业成就、实现社会融合。这是聋人教育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香港也不例外。

3.2 手语在聋人双语发展中的重要性

Grosjean (2001) 提出聋童应有发展手语和口语为双语的权利。Marschak (2004) 肯定自然手语在聋人教育中的重要性, 他观察了一系列相关研究, 结果是没有实证显示聋童发展自然手语会妨碍他们口语的发展。如听力学家 Yoshinaga-Itano (2006) 发现, 聋童若在幼年已掌握一定水平的词汇表达能力, 无论是口语或手语, 他们仍能发展同样良好的言语能力。Preisler 等 (2002) 在瑞典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22 位在手语双语的环境下成长的聋童中, 手语能力最好的, 其口语能力也最好。近年手语语言学及手语获得研究的兴起, 已经证明当聋童拥有第一语言的信息后, 就可通过第一语言学习第二甚至第三语言。手语更可成为聋童通过读写学习口语语文的一个桥梁 (Wibur 2000, Plaza-Pust and Morales-Lopez 2008)。其实以往的研究已指出, 聋人父母所生的聋童在学前已经掌握了一套完整的语言和沟通技巧, 他们的学业成绩, 包括第二语言的阅读能力, 都较健听父母所生的聋童为佳。Mayberry (2007) 通过语言测试来观察聋童发展美国手语及英语作为第一和第二语言的关系, 结果是延迟聋童第一语言获得最终只会令他们得不到完整的语言结构认知, 对第二语言发展尤为不利。

以上种种研究结论可以从语言获得理论得到解释。根据 Berent (2004) 的分类, 聋人第二语言发展要看聋童接触这个语言的时间。聋童第二语言可以在已经有第一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过来, 即我们所谓的连续双语 (sequential bilingualism)。但是, 他们也可以享有同步双语 (simultaneous bilingualism) 的发展权利。双语获得研究已经提出, 基于儿童认知发展、语料输入数量、内在语言结构认知等因素, 这两类双语的发展过程在某些层面是不同的。Paradis (2008) 就发现同步双语的儿童在英语形态方面的语法判断能力比连续双语的儿童强, 而这两类儿童在同一个测试中的分数又都比单语儿童的高。以上研究带出了语言迁移在第二语言获得或双语获得中的重要性。其实早期学者如 Selinker (1972) 就提出, 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

程中语言转移是发展目标语的自然现象,是学习者既有的第一语言认知跟第二语言信息间的一种语言相互处理的结果。正因为双语获得涉及多于一种语言的学习,语言转换也是重要的学习过程(Yip and Matthews 2007; Meisel 2004)。无论是第二语言获得还是双语研究,语言获得专家关注的是怎样找到从语言内在结构的特性来解析语言转移的先决条件。

目前聋人双语获得研究还在起步阶段,还没有系统地观察手语跟相关口语两种语言内在结构的特性而作出语言转换的条件。可是我们可以肯定,这个语言转换正是聋童手语双语发展的哲学基础。手语双语所产生的语言是聋人学习两种自然语言相互磨合的成果,跟目前我们常常看到的手势口语不一样。手势口语是一种在口语语法的基础上加上手语以配合口语操作的人工语言,它除了没有自然手语的语法规律之外,也为了配合口语语言特征的要求,往往补上了不少的人工手势语,比如中文的功能词、动词小词和句末小词等就必须加上相应的人工手势语。以前自然手语还没得到重视时,一些美国教育家就尝试利用手语的字词,加上一些英语语法上的标记(如时态标记、动词一致关系标记等),创造出一些以手势表达的口语,一般称为手势符号英语(manually coded English)。Signed Essentially English(简称 SEE I)、Sign Exact English(简称 SEE II)、文法英语(Signed English)及口手标音法(cued speech)均属手势口语。这些教育学家认为把口语转成手势符号的话,聋童便可通过手势学会口语。其实,在这种教学模式下,聋童仍然局限于单语发展,过去的研究也证明这种方式效果不太理想,因为这种手势口语的即时操作量过高,用手势口语的人往往会把功能词类略去,聋人看到的只是零碎的口语语言信息。这种语料输入对聋童语言发展往往构成障碍,因为自然语言系统具有的内在复杂性、完整性都被破坏了,聋童最终无法通过接触一个完整语言系统来获得语言(Spencer and Tomblin 2006)。其实当聋童接触中文后,双语获得过程会令聋童慢慢认识手语和相应口语的分别。除了自然手语外,聋童日渐增加的中文语法认知也会让他们在某种外在情况下选用手势口语作为沟通媒介。这说明操自然手语的聋人自身有比较丰富的手语变体,可增强他们对两种语言的元语意识(Bialystok 2001)。邢敏华在 Marschark(2004)的译文中结合聋童学习中文的情况引申了他的论点,即当聋童有了自然手语的基础之后,自然衍生的手势口语也可以成为聋童学习中文的一个渠道。

3.3 手语双语的教育模式

在聋人教育历史上,单靠口语的教育模式来普遍提高聋人读写能力及学业以达到跟健听人同等的水平似乎还有一段距离。在1980年代末,一些美国学者开始提倡手语双语的教育模式。这个模式是把聋人使用的自然手语和聋人文化跟主流社会所使用的口语和文化摆放到同等地位。手语双语教育让聋童获得较完整的语言系统,有较好的读写能力,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正视自己作为聋人的身份。

手语双语教育有多个实践模式,以美国为例,大致可分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是利用美国手语和手势英文,手势英文用于帮助学生学习英语。在第二种模式中,美国手语是一个过渡性的教学语言,只会在低年级使用,当聋童掌握美国手语后,教师会逐渐改用手势英文进行教学。第三种模式跟第二种模式差不多,区别在于容许美国手语和手势英文在教育系统中并存。第四种模式中所提到的口语则只包括书写能力,因为这是聋童可以完全接收的部分

(Singleton et al 1998)。其实手势英语、手势汉语等都不是自然语言, 由于它的语言呈现系统并不完整, 不少学者认为教师不应刻意在课堂中单一地使用手势口语 (Supalla 1991; Davilson et al 1996)。除此之外, 只用书写形式学习口语的方案也有它的限制, 教育学家提出不应误以为聋童单从接触书写口语便可以像健听儿童一样获得口语的完整结构 (Singleton et al 1998)。

不管是哪一种实践模式, 手语双语教育在挪威、荷兰、法国、丹麦等其他国家也日渐盛行, 且已经被证实对聋童的语言、社会和心理发展均有益处 (Plaza-Pust 2005)。近年来, 一些中国学者也注意到这套教育模式, 赵锡安 (2004)就讨论到中国聋人教育和双语双文化的教学研究。沈玉林等 (2005)阐述了他们在南京、镇江、常州、苏州和扬州进行的双语聋教育项目的经验。Yang (2008)也概括介绍了手语在国内聋人教育的历史及双语模式在中国各地聋校的应用情况。

总的来说, 聋人教育中的手语双语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指自然手语和口语的书面语, 第二类是指自然手语和整套口语 (包括言语和书面语)。前者一般为聋人学校采纳, 后者则在手语双语共融教育 (sign bilingual and co-enrollment program)中体现。

3.4 手语双语共融教育

Grosjean (1992)指出, 要成为手语双语者必须有使用两种语言的环境。在全纳教育 (inclusive education)的教育理念下, 手语双语共融教育是指聋健学生共同融入一个常规的课堂里, 最理想的就是由一名操流利自然手语的健听老师和一名聋人老师协作教学。这种环境提供一个让聋或健听的学生学习手语和口语的机会。由于健听学生跟老师都懂得手语, 聋生就能跟他们一起参与各种课堂活动, 也可通过手语让聋生有效地接收课堂信息, 这种聋健同伴和手语双语的学习环境减少了在一般主流教育下聋生容易被孤立的机会, 也提供了双语双文化的自然环境。目前有关手语双语共融教育项目的研究不多 (Krichner 1994 Kreimeyer et al 2000 Antia 2005 De Klek and Hemans 2010 Tang 2010a), 这类教育模式注重“关键人数” (critical mass)这个概念, 聋生和健听学生最理想的比例是 1比1。Antia等 (待刊)则认为按实际聋生的人口分布, 若能达到 1比3 或 4的比例, 相信已可有效帮助聋健两个群体互相接纳对方的语言跟社交方式, 让健听学生长期在一个明显的聋人语言族群中成长。

虽然手语双语共融教育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 但现有的结果指出聋生在学业、社交和沟通等层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Krichner 2000 Kreimeyer et al 2000)。Antia (2005)的研究指出, 在手语双语环境下聋生的成绩表现虽未及健听学生, 但能达到美国全国聋生成绩表现标准的 50% 或以上, 这显示他们的学习表现已比一般聋生好。荷兰在 2004年也开始推行手语双语共融教育项目, 其研究显示该项目对聋生在手语双语的发展、学习成绩、社交等方面都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De Klek and Hemans 2010)。

3.5 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手语双语教育

上文提到, 随着手语语言学的发展, 手语双语教育项目在许多欧美国家已广泛推行, 中国内地和香港近年也发展了数个相关项目。从 2001年开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天津聋人

学校合作开展了一项名为“聋儿双语双文化项目”。由于成效良好，这个项目已拓展至四川、广东等地区 (Wang 2008)。另一教育项目由中国爱德基金会于 1996 年在南京一所聋校开始推行，此后爱德基金会和挪威聋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江苏省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亦于 2004 年合作推行“中挪 SigAm 双语聋教育项目”。5 年间，经过在江苏、四川和广州 8 所聋校推行的经验，此项目也验证了聋童手语双语教育的重要性 (Wu 2010)。

香港第一所聋校的成立可追溯至 1935 年。在 1970 年代之前，聋校采用的语言政策大致可分为口语为主或手语为主两种 (Lo et al 2010, Sze et al 手稿)。在口语主导的学校，虽然整体上缺乏稳定的手语语料输入，但是大部分的聋生会通过朋辈间的交流而接触手语。至于手语主导的聋校，老师使用手语教学，协助聋生理解课程的内容及学习作为第二语言的书面语。“华侨聋哑学校”是香港第一所使用手语的聋校，该校的聋人校长引入南京 / 上海手语，可以说是香港手语早期的变体。整体来说，在 1960 年代末，有超过六成的聋生使用手语上课，这些学生都是在手语双语的环境下长大的。其后政府开始推行融合教育，绝大部分听障学生都已入读主流学校，目前香港只剩下一所口语主导的聋校。

在香港，手语语言学于 1990 年代初开始发展，到后期也慢慢关注聋人教育语言的问题。由于社会对手语存在误解，聋校对全面推行手语教学仍然有所保留，要在聋校推行手语双语聋人教育实在困难。在 2006 年，香港启动了一个名为“赛马会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计划”的聋人教育试验计划。此项目是香港首次探讨手语在融合教育中的作用，以及手语在教学语言、双语发展和语文能力方面如何惠及聋健学生 (在此“聋生”泛指听力损失程度不同的学生)。至今该项目已发展到上至小学四年级，下至幼稚园中班，试点班里聋健学生的比例大致为 1 比 3 或 1 比 4。受益的聋健学生到目前大概有一百多名，其中聋生有 32 名。在这种学习环境里，聋健老师合作以手语和口语教导聋健学生。此计划还包含不同层面的研究项目，包括课堂研究，聋生的言语发展、中文语法认知发展和手语语法认知发展。下面我们简略描述该项目在 2006 年 8 月至 2010 年 7 月期间的一些初步研究结果 (Tang 2010b)。

课堂研究显示聋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在一年间有明显的提升。聋童在双语学习环境下慢慢学会灵活运用口语或手语跟同学沟通、建立良好的关系，这类课堂也促进了健听学生对聋生特殊需求的认识。而且，聋童的口语发展并没有因为使用手语而受影响，相反地，聋生的口语和手语的认知发展则相辅相成。事实上，根据《雷妮氏语言发展量表—广东话》(Reynell Developmental Scale-Cantonese) 的测试结果，试验计划的聋生在接收语言和表达语言两方面均得到持续发展。在 19 位参与计划超过一年的聋生中，有 3 位已达到一般同龄儿童的语言能力水平，他们的表现已超越此量表的最高评分。剔除这 3 位聋生的评估表现，平均来说，其余 16 位聋生的接收语言在一年间有 0.94 年的增长，而表达语言则有 1.54 年的增长。若假设一般健听儿童每一年应有一年的语言能力增长，这个结果表明了聋生并没有因为学习手语而影响说话的能力。相反，丰富的手语双语语言输入条件反而增强了聋童语言认知能力的基础，也间接支撑了口语的发展。

另外，聋生在《学前及初小儿童中文识字量表》(李晖 1999) 中的测试表现了他们的中文词汇知识跟先前常规学生在同一测试中所得的平均值相若。中文书面语语法测试显示了聋生

对不同语法结构的理解程度, 其中他们对存在句、有定性和结果复合动词等尤感困难。但是, 聋生的错误跟一般儿童在中文语言发展中的错误吻合, 这说明聋生学习中文的过程跟健听孩子学习口语差不多。最后, 因为项目中的聋生大多是入学后才学习手语, 所以也要观察他们的手语发展情况。研究发现聋生均能有系统地通过手语理解或表达一些简短的句子或故事, 他们理解香港手语的能力比用手语表达的能力强。而且, 接触香港手语时间越长的聋童测试表现也越优秀, 这意味着聋生的手语语法知识及其叙事能力在几年间都有很大的进步, 其手语能力则成为他们学习及接受教育的重要媒介。不论是言语还是书面语, 手语成为他们学习这些语言的基础。

4 结语

手语语言学致力于探讨聋人的自然手语以及聋童的语言获得过程, 从中我们发现自然手语在聋人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现今不少研究已指出, 聋童有能力同时掌握手语和口语, 联合国在 2006 年的《残疾人权利公约》内也有不少条文明确规定《公约》缔约国有义务推广手语作为聋人的语言, 意味着聋人有权利通过手语双语接受教育。所以在聋校或者在主流学校发展手语双语教育模式是必须的, 让聋人教育方案不再是单一的, 而是多元化的选择。虽然目前手语双语共融教育只在欧美、香港等少数地方进行试验, 但从现今研究的数据中可以看到, 这个模式除了可以为聋童提供主流的学习课程之外, 也让聋童在一个平等的双语环境下成长, 他们的自信心、社交能力等都比目前在单语的主流教育下受孤立的聋生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当然, 作为聋人教育的一个新方向, 它还需要通过许多科学化的研究去验证和修正。

引用文献

- Antia S D. 2005. Documented research on the academic and social status of hearing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student participating in co-enrolled classrooms.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Deaf Maastricht The Netherlands
- Antia S D., K. H. Krämerer, K. K. Metz and S. Spolsky. Peer interactions of deaf and hard-of-hearing children. In M. Marschark and P. E. Spencer, eds., *Oxford Handbook of Deaf Studies, Language, and Education* Vol. 1. 2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4–76
- Antia S D., M. S. Stinson and M. G. Gaustad. 2002. Developing membership in the education of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students in inclusive settings.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7, 214–28
- Baker A. and B. van den Bogaerde. 2008. Code-mixing in signs and words in input to and output from children. In C. Plaza-Pust and E. Morales-López, eds., *Sign Bilingualism: Language Development, Interaction, and Maintenance in Sign Language Contact Situa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28
- Berent G. P. 2004. Sign language-spoken language bilingualism: Code mixing and code mixing by ASL-English. In T. K. Bhatia and W. C. Ritchie, eds., *The Handbook of Bilingualism*. Malden MA: Blackwell. Pp. 312–35.
- Bialystok, E. 2001. *Bilingualism in Development: Language, Literacy, and Cogn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10. Cognitive advantages of bilingualism in early childhood. Keynote speech at Workshop on Bilingualism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Branchini C. 2009. One plus one makes two but also one. Evidence for syntactic theory from crossmodal

- bilingualism. AHRC workshop One Brain Two Languages Bridging Neuroscience and Linguistics on Intramodal and Crossmodal Bilingualism, Bangor University, Wales
- Campbell R. 1997. Read the lips: Specul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lipreading in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deaf children. In M. Marschark, P. Siple, D. Lill-Martin, R. Campbell and V. Everhart eds, *Relations of Language and Thought: The View from Sign Language and Deaf Childr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10–46
- Chan Brian H.-S (陈学成). 2009. Code-switching between typologically distinct languages. In B. E. Bullock and A. J. Toribio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inguistic Code-switching*.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82–98
- Pichler Chen C. 2001. Word order variability and acquisition in American Sign Languag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torrs
- Conrad R. 1979. *The Deaf Schoolchild: Languag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London: Harper & Row.
- Davidson M., E. L. Newport and S. Supalla. 1996. The acquisition of natural and unnatural linguistic devices: Aspect and number marking in MCE children.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etical Issues in Sign Language Research. Montreal
- De Klerk A. and D. Hermans. 2010. Maximizing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of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pupils. 2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Deaf. Vancouver, Canada. 2010.
- Emmorey K., H. B. Borinstein, R. Thompson, and T. H. Gollan. 2008. Bimodal bilingualism.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1, 43–61.
- Fung Cat-H-M (冯晓雯), Gladys Tang (邓慧兰), and Scholastica Lam (林慧思). 2008a. Code-switching in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The 12th Symposium o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Hua 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 . 2008b. Code-blending in early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The Conference on Bilingual Acquisition in Early Childhoo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Gallaudet E. M. 1881. The Milan Convention. *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and Dumb* XXVI (1). Pp 1–16
- Goad H. and L. White. 2004. Ultimate attainment of L2 inflection: Effects of L1 prosodic structure. In S. Foster-Cohen, M. S. Smith, A. Sorace and M. Ota eds, *EUROSLA Yearbook 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19–45
- Gregory S., J. Bishop and L. Sheldon. 1995. *Deaf Young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osjean, F. 1982. *Life with Two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to Bilingu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2. The 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person in the hearing and in the deaf world. *Sign Language Studies* 77, 307–20
- . 2001. The right of the deaf child to grow up bilingual. *Sign Language Studies* 1, 110–14
- Kirchner Carl. 1994. Co-enrollment as an inclusive model. *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139, 163–4
- Kirchner Corinne. 2000. Commentary: Disability policy, social research and the social movemen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Disability Policy Studies* Fall 2000 11, 105–8
- Kreimeyer K. H., P. Crooke, C. Drye, V. Egbert and B. Klein. 2000. Academic benefits of a co-enrollment model of inclusive education for deaf and hard-of-hearing children.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5, 174–85
- Lam, Scholastica W.-S (林慧思). 2009. Early phrase structure in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A case study. Ph.D. di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ill-Martin, D. 1991. Universal grammar and American sign language: Setting the null argument parameters

- Lo, Connie C. -Y. (路骏怡), Lisa S. -W. Lo (卢瑞华), Kenny K. -N. Chu (朱君毅), Felix Sze (施婉萍). 2010. The origin of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and early dea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The Conference on Sign Linguistics and Deaf Education in Asia.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MacSwan, J. 2009. Generative approaches to code-switching. In B. E. Bullock and A. J. Toribio,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inguistic Code-Switching*.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09–35.
- Marentette, P. F. and R. I. Mayberry. 2000. Principles for an emerging phonological system: A case study of early ASL acquisition. In C. Chamberlain, J. P. Morford, and R. I. Mayberry, eds., *Language Acquisition by Ey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Pp. 71–90.
- Marschak, M. 2004. *Educating Deaf Students of All Ages: From Early Intention to Life-Long Learning*. Taipei: Taiwan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 Mayberry, R. I. 2007. When timing is everything: Age of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effects o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8, 537–49.
- Meier, R. 1982. Icons, analogues, and morphemes: The acquisition of verb agreement in American Sign Languag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 Meisel, J. M. 1994. Code-switching in young bilingual children: The acquisition of grammatical constraint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6, 413–39.
- . 2004. The bilingual child. In T. K. Bhatia and W. C. Ritchie, eds., *Handbook of Bilingualism*. Oxford: Blackwell. Pp. 90–113.
- Muysken, P. 2000. *Bilingual Speech: A Typology of Code-Mix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ichols, J. G. and A. E. Geers. 2007. Will they catch up? The role of cochlear implantation in the spoken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with severe to profound hearing loss.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50, 1048–62.
- Paradis, J. 2001. Do bilingual two-year-olds have separate phonological system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1, 19–38.
- . 2008. Are simultaneous and early sequential bilingual acquisition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Conference on Models of Interaction in Bilinguals. University of Wales, Bangor.
- Paul, P. V. and S. P. Quigley. 1994. *Language and Deafness*. 2nd edition. San Diego, CA: Singular.
- Platz-Pust, C. 2005. Language contact in deaf bilingualism. In H. Leuninger and D. Happ, eds., *Gebärdenspracher Struktur, Entwurf, Verwendung, Linguistische Berichte Special* 13. Hamburg: Helmut Buske Verlag. Pp. 271–308.
- Platz-Pust, C., and E. Morales-López. 2008. *Sign Bilingualism: Language Development, Interaction, and Maintenance in Sign Language Contact Situa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Preisker, G., A. -L. Tvingstedt, and M. Ahlström. 2002. A psychosocial follow-up study of deaf preschool children using cochlear implant.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28, 403–18.
- Quadros, R. M. de and D. Lillo-Martin. 2007. Gesture and the acquisition of verb agreement in sign languages. In H. Caunt-Nulton, S. Kulatilake, and I. Woq, eds., *Proceedings of the 31st Annual Boston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Somerville, MA: Cascadia. Pp. 520–31.
- Quintor-Pozos, D. 2008. Sign language contact and interference: ASL and LSM. *Language in Society* 37, 161–89.
-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10, 209–31.
- Singleton, J. L., S. Supalla, S. Litchfield, and S. Schley. 1998. From sign to word: Considering modality constraints in ASL/English bilingual education. *Topics in Language Disorders* 18, 16–29.
- Sorace, A. 1993. Incomplete and divergent representations of unaccusativity in nonnative grammars of Italian.

- Spencer, L. J. and J. B. Tomblin. 2006. Spoken language development with “Total Communication”. In P. Spencer and M. Marschark eds., *Advances in the Spoken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Deaf and Hard-of-Hearing Childr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6– 92.
- Spencer, P. E. and M. Marschark. 2010. *Evidential-Based Practice in Educating Deaf and Hard-of-Hearing Stud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palla, S. 1991. Manually coded English: The modality question in signed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P. Siple and S. Fischer eds., *Theoretical Issues in Sign Language Research Volume 2: Acquis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85– 110.
- Sze, Felix, Connie C.-Y. Lo, Lisa S.-W. Lo and Kenny K.-N. Chu. Tracing the origin of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Tang, Gladys. 2010a. Sign bilingualism and co-enrolment in deaf education: Merging linguistics and deaf education research in Hong Kong. The 2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Deaf, Vancouver.
- . 2010b. *The Interim Report of Jockey Club Sign Bilingualism and Co-enrolment in Deaf Education (JC-SLCO) Programm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Tang, Gladys and Cat H.-M. Fung. 2009. Codeblending in early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AHRC workshop One Brain, Two Languages: Bridging Neuroscience and Linguistics on Intramodal and Cross-Modal Bilingualism, Bangor University, Wales.
- Tang, Gladys, Scholastica Lam, Felix Sze, Prudence Lau and Jafi Lee. 2008. Acquiring verb agreement in HKSL: Optional or obligatory? In R. M. de Quadros, *Proceedings of Theoretical Issues in Sign Language Research Conference 10*. Brazil: Editora Arara Azul. Pp 613– 38.
- Tsimpli, I.-M. 2005. Variation in the L2 speaker. In K. Brown, ed., *Encyclopa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13*. 2nd Edition. Oxford: Elsevier. Pp 387– 94.
- Wang, Liqun (王立群). 2008. UNICEF bilingual/bicultural approach for Deaf children. An interim report. The Workshop on Sign Bilingu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Wilbur, R. B. 2000. The use of ASL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and literacy.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5: 81– 104.
- Wu, Anan (吴安安). 2010. SigAm Bilingual Deaf Education projects in China. The 2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Deaf, Vancouver.
- Yang, Jun-hui (杨军辉). 2008. Sign Language and oral/written language in deaf education in China. In C. Platz-Pust and E. Morales-Lopez eds., *Sign Bilingualism: Language Development, Interaction, and Maintenance in Sign Language Contact Situation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Yip, Virginia (叶彩燕) and Stephen Matthews. 2007. *The Bilingual Child: Early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Conta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oshinaga Itano, C. 2006. Early identification, communication mod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eech and spoken language skills: Patterns and considerations. In P. Spencer and M. Marschark eds., *Advances in the Spoken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Deaf and Hard-of-Hearing Childr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98– 327.
- 李 晖, 1999, 学前及初小儿童中文识字量表的编制与初步效应检验。《心理发展与教育》第 3 期, 18– 24 页。
- 马马克著, 邢敏华译, 2004 《教育所有年龄层的聋学生——从早期疗育到终身学习》。台南: 供学出版社。
- 原著: Marschark, M. 2004. *Educating Deaf Students of All Ages From Early Intervention to Life-Long Learning*. Taipei: Taiwan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 沈玉林、吴安安、褚朝禹, 2005, 《双语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北京: 华夏出版社。
- 赵锡安, 2004, 《聋人双语双文化教学研究》。北京: 华夏出版社。

第一作者简介

邓慧兰, 女, 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教授。研究兴趣: 手语语言学、语言获得、聋童口语发展、聋人教育、第二语言获得。代表作: 《香港手语词典》。电子邮件: gtang@cuhk.edu.hk

Gladys Wai Lan TANG, female, Ph.D.,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Modern Languag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r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sign linguistics, s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spoken language development by deaf children, deaf educati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er major publication is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Dictionary*. E-mail: gtang@cuhk.edu.hk

作者通讯地址: 香港中文大学 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 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

Joint Symposium on the Interfaces of Grammar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Joint Symposium on the Interfaces of Grammar”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on October 19–21, 2011.

The symposium aims at bringing together researchers of phonetics, phonology, morphology, syntax, semantics, psycholinguistics and pragmatic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modules of grammar and the cross-modular computation at the interfaces.

The study on linguistic interfac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areas of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and it is assumed tha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language faculty can reveal the operations of language within human mind/brain. In Chinese, interface operations play an even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ammatical system of the language as boundaries between the core components of Chinese grammar often are not so clear. For instance, in Chinese, syntax can directly interface with pragmatics in linguistic computation. More and more interesting research works have emerged at the interfaces in linguistics, and we think that it is high time to organize a symposium in Beijing to facilitate cross-disciplinary discussion on the interface strategies and some of the important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he grammar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tential issues to be addressed include the following interface themes: Syntax-Phonology-Phonetics, Syntax-Morphology, Syntax-Information Structure, Syntax-Semantics-Pragmatics, Psych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Computational System of the Language Processor in the Human Mind/Brain.

The paper presentations will focus on the empirical problems and issues concer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grammar. Discussion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anguage faculty and cognition/brain will also be encouraged.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symposium will be English.

Organized by (1)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Laboratory,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and The Halliday Center for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of Language Studi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tyU).

Conference Venue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the highest academic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We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in Beijing.

Organizers Prof. Jianhua Hu (CASS), Prof. Haihua Pan (CityU), Prof. Aijun Li (CASS), and Prof. Por-lun Peppina Lee (CityU).

For any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the conference organizers by sending emails to linterfaces@gmail.com.

analysis in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HKSL). Path movement and local movement are two classes of movement in signs. Path movement contains setting and shape features. Local movement is subcategorized into orientation change and aperture change, the two of which have their own terminal features. There still exist other movement properties like repetitions, returning and trails which show lexical contrasts. Their corresponding formal feature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Keywords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sign phonology, movement types, lexical contrast

HE Jia Instrument classifiers in Tianjin Sign Language

Careful analysis on the elicited data of instrument classifiers (ICLs) in Tianjin Sign Language (TSL) shows that instrument classifier handshap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whole entity classifier, handling classifier and whole entity + handling classifier. It is found in ICLs that classifier handshape itself cannot determine the argument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transitivity of the whole predicate. Agent-oriented non-manuals have been used to test the existence of agent argument in ICLs. It is found that the signer's body has syntactic agreeme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agent argument in all three types of instrument classifier predicates. This shows that signer's body has similar grammatical function as the classifier handshape. Although researches in the literature mostly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classifier handshape, it is proposed that signer's body is also a type of classifier, which has similar grammatical function as classifier handshape in instrument classifier predicates in TSL.

Keywords Tianjin Sign Language, instrument classifiers, argument structur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behavior

Prudence S. Y. LAU, Causative alternation in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This study examines causative-unaccusative alternation in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HKSL). In particular, it examines what properties contribute to transitive-unaccusative alternation and present an analysis that accounts for such phenomenon.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causative alternation takes place when a human volitional agent associated with a specific classifier is the external argument. In signed languages, while the verb root remains unchanged between the causative and unaccusative pair, this alternation is realized through a change of classifier handshape. The causative alternation, however, is not observed when there is a non-volitional external argument. A series of two classifier predicates to encode the cause and result is required.

Keywords causative alternation,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classifiers

Gladys W. L. TANG, Directions on research into verb acquisition in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The sign languages under investigation so far share a common system of verb categorization: plain verbs, agreement verbs, spatial verbs and classifier predicat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deaf children of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acquire these verbal categories and their morpho-syntactic propertie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ir acquisition process can be accounted for by V-to-v movement in generative syntax.

Keywords sign language, verb acquisition, classifier predicates

Gladys W. L. TANG, Chris K. M. YIU, Scholastica W. S. LAM, Cat H. M. FUNG, and Felix Y. B. SZE, The insight of sign bilingualism research on deaf education

Sign bilingualism in the past was just a concept with very little research. Recently, research into Sign Linguistics and s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by deaf children not only helps us understand how deaf children acquire natural sign language from deaf parents, but also how they grow up being sign bilingual with processes demonstrating code-switching or code-blending phenomena. Relevant research findings have also begun to stimulate many researchers to reconsider the different modes of communication engaged by deaf people and the use of natural sign language in deaf educ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sign bilingualism can be carried out not just in deaf schools, but also in a co-enrollment setting against the general backdrop of inclusive education. The paper ends by describing some relevant research projects conducted in China and Hong Kong that is based on sign bilingualism and co-enrollment in deaf education.

Keywords sign linguistics, language acquisition, sign bilingualism, deaf education, co-enrollment education